

● 中国传统文化

外来词：回忆与思考

史有为

(日本明海大学 外国语学部 日本 千叶县 279-8550)

[作者简介] 史有为(1937-),男,江苏常州人,日本明海大学外国语学部教授,日本中国语学会理事,日本现代中国语研究会会长,日本《现代中国语研究》杂志编委会代表,主要从事汉语语法、外来词、对外汉语教学等研究。

[摘要] 中国学者对外来词的研究经历了一个长期、艰苦的学术历程,1978年出版的《汉语外来词词典》是这项工作 的一个总结。以往的研究常常囿于纯粹的语言学范围,与文化学和文化史的工作少有联系,冯天瑜著《新语探源》将语言与社会—文化史的互动综合起来考察,取得了很大突破,其关于“回归侨词”的研究尤富创识。

[关键词] 新语探源;外来词;回归词;文化史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5)06-0734-03

在中国语言学界里,大概罗常培先生的《语言与文化》(1950)第一个论述外来词及其与文化的关系。但以传统语言学论述来看,高名凯和刘正琰先生可谓是外来词研究的开路者。他们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1958)是语言学界第一部专门就此作了认真研究的专著,虽然出发点是规范,而且也还存在多处不足和遗憾。高先生是我在北大时教授普通语言学的老师。由于先生的广博知识和敏捷智慧,由于他的平易近人和坦率风趣,受到学生们广泛的尊敬和爱戴。可惜,在我1978年参与编写《汉语外来词词典》之前,高先生已于1965年不幸因病早逝。当时外来词词典的第一稿也早已初成。由于出版方面的种种辖制和随后的“文革”而遭遇的不顺,这部稿子未能面世,而高先生也只能抱憾而去。高先生所没有完成的是如何从当时的基础上再深入地往社会—文化关系以及方法论方面迈出一步,从而建立起外来词的学科。这也许是他永远的遗憾。

之后,刘正琰先生承担起继续努力的责任。为了提高稿子的质量,刘先生组成新的编纂班子,决定重新审订和编写所有词条,并补充新的条目。在编纂小组中,刘先生是当然主编,麦永乾先生任教今广东外经贸大学,专攻日语和俄语,我最年轻,也是初入此门,更多的是为了学习。刘先生负责除俄语以外的西语来源外来词,是词典中分量最重的部分。为了重编词典,麦先生请了长假,住在北京3年多专门改编词条,以便经常碰头商议词条。我负责的部分是核对并增补梵文以及除西方语言和日、俄语以外的古今其他民族语言来源的外来词。交到我手上的是高先生亲笔手写的一张张词条卡片。高先生的字体我早在北大已经熟悉,不属凝重端正,但绝对洒脱无羁,灵气透逸,真正的字如其人。看了这一张张,一字字,当时给人的震撼可想而知。以高先生这样的地位和学养,甘愿作如此琐细辛苦的书写工作,如果没有崇高的理想和追求,没有脚踏实地的力行精神,那是不可能的。高先生有高瞻远瞩的思想,而且还是一位实干家。刘先生旧学和英语造诣很深,苦干实干,说到做到。刘先生和我都在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任教,不可能全职从事,只能课余之后,忙里偷闲,再加起早贪黑,利用假日完成。

来自日语的汉字词是编纂中最为困难部分之一,一是没有太多的研究积累,其次文字形式又和汉语

固有词非常相像, 极易指鹿为马, 三是资料和研究时间的不足。麦永乾先生这次即使已为此花了3年时间, 一条条地提取并核对, 从1958年的456条一下子增加到近900条, 几乎多了一倍, 实属不易。但由于以上三项局限, 也肯定有不当收入之词。这部分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与修正。然而历史地看, 这样的一些问题也是研究所必然会经历的。

从1958年高、刘二位的外来词专著算起, 经过“文革”的磨难和沉寂, 又迎来了1978年出版《汉语外来词词典》, 到现今的2005年已经快半个世纪, 外来词研究可以说已经基本上站住了, 而且翻开了新的一页, 开始了对包括外来词在内的新词语与文化—社会之间互动的探索。这新的探索历程却大多非语言学界所为, 比如冯天瑜先生的《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就是史学界的最新探索成果, 它们已大大超越了当年的研究水平。高、刘二位先生若地下有知, 看到今日围绕外来词的研究已经蔚然成风, 当含笑感谢这些老手与新锐。

冯天瑜先生以“新语探源”和“文化互动”开题点睛, 出乎意料又合乎情理。书中关于中西文化互动的论述可谓比比皆是, 而以词语和文化相对勘的论述也在在可见, 读后颇有所感。我非常赞成这样的研究视角。纯粹的外来词研究和外来文化/文化史研究是两个不大相同却又联系紧密的领域, 当下语言学界往往画地为牢作茧自缚, 囿于纯粹语言性质的研究, 而且都注目于收集当代刻下的词条, 论述汉字转写, 再多一些就是约略谈论词汇反映现实的观点。这些当然也不错, 但做起来却容易许多。而困难的部分, 也就是词源考证尤其是近代语词的考证却少人关注。另一方面, 对近代的外来词及其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又望而生畏, 很少有人敢于攻城略池。这是一些令人忧虑的倾向, 发展下去很可能会葬送语言学的外来词研究。这些话看起来似乎有些危言耸听, 其实却并非虚妄。汉语外来词的研究本来就并非自语言学界开始, 最初是人类文化学界艰难创始的。有些外国人(比如伯希和、斯坦因)虽然有不好的名声, 但却无法否认他们在这些外来词结合人类文化学方面的研究成就。他们把词源考证和社会考察结合在一起, 从而揭开了许多历史的悬案。之后中国许多历史学家也接踵而至, 共时和历时并举, 解决了历史和文化上的许多难题。如此看来, 缺少确切词源的语词依据, 就无法说明当时的社会和文化, 而没有依托于社会和文化, 外来词本身也就没有多少意义。而这一切又需要相当数量的语词或非常有代表性的语词做基础。因此, 语词来源的考证一向是外来词研究和异文化交流研究的基础工作。老一辈的外来词研究家, 例如罗常培、季羨林、冯家升、岑仲勉和张清常等先生都把外来词和文化甚至社会联系起来研究。也由于这样的原因, 我主张在文化互动的基础上再向前迈进一步, 把共时语词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和互勘作为一种本体和方法来对待, 把我们的研究推进到新的高度。我以为, 《新语探源》以新词的个案和概观共举, 结合文化和社会, 史论并重, 可说是对上面这样的主张作了很好的注解与实践, 应当说是近年来外来词—新词研究方面的一大收获。

《新语探源》中提到早期汉译西书中有些语词被日本所接受并广泛使用, 而中国当时却流布未广, 到后来中国反而要从日语中倒输入。作者以为这些语词不应该算作外来词, 而应恢复其“回归侨词”的身份。这段话我是基本同意的。不过平心而论, 这样的误会也是历史的必然, 很难责怪。当初对这段语言历史研究甚为不足, 大量文献没有被重视、被勾乙、被利用, 连国家重点项目的《汉语大词典》都很少举出这些文献作书证。就汉字词形一致的类型而言, 可以举出现代意义上的“保险”为例, 很多人都认为这个新义古词来自日本, 《日本国语大辞典》上记载日本1879年8月2日《朝野新闻》已见(保险公司广告), 而《汉语大词典》刊出的书证是1984年6月21日的《文汇报》, 相差100余年, 归属日语源似乎毫无问题。其实, 中国至少在1875年张德彝的《欧美环游记》中已经出现, 而这个源头却只是在20世纪末才查得。又如, 现代意义上的“博物”一般也认为是来自日本, 是日本借用古汉语词形注入新义, 在1877年久米邦武《米欧回览实记》中已经使用, 《汉语大词典》只注明释为“万物”的一义见于唐代玄奘的《大唐西域记》, 而在后来的“博物”学科一义上却举不出书证, 似乎属于日语创注新义无误。然而, 也是在前几年, 人们发现中国在1855年的《博物新编》中已经使用了这个新义。新义更毫无疑问的是“博物馆”, 日本在1862年《海外新闻别集》见到此词, 《汉语大词典》则举出当代郭沫若的《进译曲》作书证。同样, 也是近

几年,有人发现中国在 1844 年的《四洲志》里早已采用。如果以此作为最终的源头,改写归属,却又是冒险,谁知道未来会不会出现新的资料。这说明词源考定很像考古,带有相当的假定性,因此结论也常常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几乎处处是陷阱。许多词源判断可能随着资料的陆续发现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我们必须有宽谅的态度。

回想在编写之初,我们曾经对日语来源的词以及“回归词”做了一次讨论,一致同意词形为汉语旧有而由外民族改变或注入了新义的词应列入词典收录范围;如果词义没有改变的则不算外来词。我们谈到有一类词像“喇叭”和“章京”,最初是汉语的“螺贝”和“将军”,被国内的民族语借用并改变了语音形式和意义,以后又倒过来借入汉语。这是一种回归,有人也比喻为所谓的“词侨”。另一种回归词就是意义完全相同的汉语词在中国断了承续,以后由借入的语言那里再倒借入。我记得我们在编写词典时不承认这是外来词,也就不予收入。这两种有人都称为“词侨”或“侨词”,其实这两种是完全不同的类型。因此,在词典编纂中由于资料的缺乏和研究的不足,产生某些误认是正常的,应该历史而分别地认识这些问题。《新语探源》在“侨词”这个问题上提出了一些正面的看法,并且以“侨词来归”为题专节论述,有着范例的作用,我觉得在深入认识中外语言—文化交流和互动上这是很有意义的。

(责任编辑 桂 莉)

Some Thoughts and Recalls on the Study of Loan Words and Hybrid Words

SHI You-wei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Meikai University, Japan Chiba 279-8550)

Biography: SHI You-wei (1937-), male, Professor,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Meikai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hinese grammar, Loan words and Hybrid words, and Chinese teaching to foreigners.

Abstract: The study on Loan words and Hybrid words in China has gone through a long and hard academic process. A Dictionary of Loan words and Hybrid words in Chinese, published in 1978, is a summarizing work in this field. Previous Studies tended to be limited in pure linguistic realm, and took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works in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field. However, recently published Professor Feng's *The Origins of New Words and Phrase* makes a breakthrough because of its synthetically and comprehensive study in these two fields. Specially, the discusses in this book about returned words (i. e. the so-called “returned overseas words”) are worthy being affirmed.

Key words: *The Origins of New Words and Phrase*; Loan words and Hybrid words; returned words (i. e. the so-called “returned overseas words”); cultural history